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满蒙权贵与20世纪初的政治生态研究书系

# 宗室王公与清末新政

孙燕京 主编

周增光 著



卷之八 宗室王公



中国石化出版社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PRESS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满蒙权贵与20世纪初的政治生态研究书系

# 宗室王公与清末新政

孙燕京◎主编

周增光◎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宗室王公与清末新政 / 周增光著. --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7.12

(满蒙权贵与 20 世纪初的政治生态研究书系 / 孙燕京主编)

ISBN 978-7-5080-9392-5

I. ①宗… II. ①周… III. ①满族—贵族—研究—中国—清代  
②体制改革—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1791 号

---

## 宗室王公与清末新政

作 者 周增光  
责任编辑 杜晓宇 王 敏  
责任印制 周 然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275 千字  
定 价 52.00 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 100028

网址: [www.hxph.com.cn](http://www.hxph.com.cn) 电话: (010) 64663331 (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 问 刘家和 瞿林东 郑师渠 晁福林

主 任 杨共乐

副主任 李 帆 易 宁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宁 欣 刘林海 安 然 张 升

张 皓 张 越 张荣强 张 建

吴 琼 周文玖 罗新慧 郑 林

庞冠群 侯树栋 姜海军 郭家宏

耿向东 董立河

## 出版缘起

在北京师范大学的百余年发展历程中，历史学科始终占有重要地位。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今天的北师大历史学院业已成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是国家“211”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单位，首批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单位。拥有国家重点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等一系列学术平台，综合实力居全国高校历史学科前列，被列入国家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行列，正在向世界一流学科迈进。在教学方面，历史学院的课程改革、教材编纂、教书育人，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曾荣获国家教学改革成果一等奖。在科学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出版了由白寿彝教授任总主编、被学术界誉为“20世纪中国史学的压轴之作”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后，一批底蕴深厚、质量高超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如十卷本《中国文化发展史》、二十卷本《中国古代社会与政治研究丛书》、三卷本《清代理学史》、五卷本《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二十三卷本《陈垣全集》以及《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上博简〈诗论〉研究》等巨著，这些著作皆声誉卓著，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得到同行普遍好评。

上述著作外，历史学院的教师们潜心学术，以探索精神攻关，又陆续完成了众多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上连创佳绩，始终处在学科前沿。为了集中展示历史学院的这些探索性成果，我们组织了这套“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希冀在促进北师大历史学科更好发展的同时，为学术界和全社会贡献一批真正立得住的学术力作。这些作品或为专题著作，或为论文结集，但内在的探索精神始终如一。

当然，作为探索丛书，不成熟乃至疏漏之处在所难免，还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探索丛书编辑委员会

# 清末政治生态与政治史研究的 几点思考（代总序）

## 大时代与好时代

20 世纪，全球化特征日趋凸显。它的第一个十年，资本帝国主义以血以火以资本的形式急速膨胀，被压迫国家、被压迫民族遭遇到不同程度的生存危机，一些继续沉沦，一些幡然奋起，这些变化同时解构着世界。

晚清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持续的苦难，强敌逼迫，国势凋敝，当权者不得不重新选择道路。走入 20 世纪，国家历史进程演绎出波澜壮阔的画面。

我一直以为，晚清不是好时代却是大时代。所谓“好时代”包括“文景之治”、唐宗宋祖等千百年传颂的妖娆，无须更多申说，大时代的意义却往往不同。之于晚清，其“大”特指“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被迫卷入世界市场，走出专制、拥抱共和，成为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变动之剧，罕与匹敌。久居和平环境的我们，很难体会那种翻覆与动荡。1907 年，因涉嫌“康党”而避祸上海的孙宝瑄感慨：“风气至今，可谓大转移。立宪也、议院也，公然不讳，昌言无忌。且屡见诸诏旨，几等口头禅，视为绝不奇异之一名词，诚数年前余等居海上时所梦想不及也。”<sup>①</sup>如果不是身处其间，很难体会短短七八年，观念、风气、时局所发生的剧变。

解构与重构是复杂多元的裂变过程。至清末，七十年变局造就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有结构发生从中心滑落边缘、边缘位移中心的秩序塌陷。经由太平天国运动，中央地方的权力消长致使督抚始而“尾大不掉”继而“分庭抗礼”终则“离心离德”。经由新式教育、选拔人才方式的变化，导致旧士人失

---

① 《孙宝瑄日记》，中华书局 2015 年版，第 1157 页。

势、新知识分子崛起，士大夫与皇权“天然联系”的纽带断裂。经由湘淮军、新建陆军，扭转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局面，却反转为“兵为将有”的格局。至于国家财政的腐败、满汉矛盾的潜滋暗长、最高统治集团的内耗，皆导致了统治危局。如何才能“解套”？显然，想维系旧的改革思路是没有指望的。

困顿求生，预备立宪不期而遇。但对它的期许，简直是见仁见智、南辕北辙。革命派要取消君权、立宪派要限制君权、当权派要维护君权，几近各不相让。博弈的过程，就成了清末政治渐次脱离君主专制走向立宪、走向共和的过程。

实际上，清末政治走向有多种可能性。一味地论证王朝最高决策者如何走向失败不过是习惯上的后见之明。在研究中，以历史的结果预设“固定”的进程，会遮蔽历史演化本身的丰富内容和可能进程。历史学一向有解释的功能，我们想解释这些过程，想指出各种可能，想说明结局的偶然与必然。追寻怎样走偏、如何误入歧途以及违背初衷的蛛丝马迹，好似围棋高手的复盘，会有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现实价值与学术意义。

人们常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那么，行进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天命”中的“气数”又是何时“耗尽”，自我朽败又是怎样开始且逐渐加深加速的呢？

## 清末政治的研究

与清末历史同样丰富多彩的是研究的热闹非凡。就研究范式而言，革命、现代化、从西方中心到中国中心先后登场，相互砥砺；区域社会、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各领风骚，反复切磋；一些固有的热点被冷落，一些貌似不起眼的问题迸发出耀眼的光芒。

学界对清末政治的研究可谓硕果累累。例如辛亥革命，经由民国时期的



英雄谱系书写、共和国时期的革命叙述，学术层层堆垒，不仅成为高原，简直就是高山巍峨。但不可否认，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辛亥革命的研究畸轻畸重，轻易地抹去了革命之外丰富的历史侧面。彼时，清王朝统治阶级、精英阶层，甚至态度与立场略显温和的群体都被当作革命的对立面，甚少关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港台地区的学者开始把视野投向立宪派、立宪运动；八十年代后，内地研究者也陆续调整了研究视野与方法，突破了简单化、贴标签、泛革命化的框架。此后，晚清政治史至少沿着三条线索——民族民主革命的线索、政治现代化的线索、权力结构与运作的线索，在六个方面——系统化、序列化趋向；从革命史单一向度到多维视界展开、形成多元互动的态势；借鉴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框架；大幅推进制度史研究；开拓政治文化史、心态史、权贵研究等新领域；整理出版大量的晚清史资料，为研究的提升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近三十年的晚清政治史成果显赫。即便如此，大家都觉得仍有一些待深化、需拓展的空间。

具体而言，研究对象仍可进一步细化、深挖。政治史研究与政治人物密不可分，随着史料发掘整理，对那些以往被忽视的清廷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核心群体、满蒙权贵仍然有研究的空间；对清廷政策的调整、立宪认识与实施、解救危机的选择仍然有推敲的余地。甚至，清末新政取自民间的巨额经费，到底给下层人民多大的压力？百姓的“税负痛苦指数”究竟如何？是否可以进一步追索与解释？其实，自2012清帝退位百年之时，不少学者已经把视野转向了清廷权贵，试图更合理地解释鼎革之际“原体制内”的变化以及内部的自我侵蚀与消融。

卡尔说，历史是历史学家和他的客观事实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我觉得，我们并没有穷尽晚清、清末的话题（可能永远不能穷尽），很多真相还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很长时间以来，谈及20世纪初十年这一段历史，人们多把它看作辛亥革命的准备、发动、成功与失败的完整链条，言外之意，楼都塌了，分析楼的主人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还有什么意义？其实，回到历史本身，辛亥革命只是清末十年的一部分，换一句话，清末历史的多元内容远远不是一场革命所能涵盖的。

## 政治史是历史研究的脊梁

异彩纷呈的历史由人类写就。很多年里，不少研究者欣喜于社会生活的多姿多彩，欣喜于“宏大叙事”、治乱兴衰之外的丰富故事，致使政治史一定程度被“轻慢”。<sup>①</sup>但是，当我们能够回望人类社会进程时，琐碎的边边角角毕竟是海滩上的沙砾。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还是家国大事。所以白寿彝先生才感慨“政治是历史的脊梁”。

制度、人物、治乱兴衰是政治史最基本的观察点。我们立足于这一基本认知而关注清末政治大环境，也就是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是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生态、经济秩序而言的一种社会政治状态。关于政治生态，时人早有涉及。1900年，孙中山在致港督卜力书信函中指出，“朝廷要务，决于满臣，紊政弄权，惟以贵选，是谓任私人。文武两途，专以贿进，能员循吏，转在下僚，是谓屈俊杰”。他把矛头指向了朝廷，也就是满蒙权贵把持的国家政权，认为他们是导致清末政治生态失衡的“罪魁祸首”。此后，研究者多承袭革命党人的申说，对清末的政治生态一言以蔽之“腐败”。那么，当权者是否知其“腐败”？是否任其发展而不想办法、不采取措施？这些措施是否全不对症、全然无效？是措施不对还是“运气”不好？换句话说，是否清廷没有一点机会、一点“历史的余地”？在我看来，至少宣统之初，少壮亲贵是有信心的。胡思敬说：“载沣初摄政时，兴致甚高，凡批答各省章奏，变‘依议’曰‘允行’，如史臣记事之体，折尾恭誉套语辄加浓圈。后亦稍稍懈弛，视德宗时尤甚，虽交议交查密旨，或累月经年不复，亦若忘之，无过问者。”<sup>②</sup>先是积极进取，继而懈怠疲玩，很快就书写了清末政治的一个“常态”，为什么？这与人们惯习的“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的认知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20世纪初的中国，处于政治大转型时代，彼时存在着险中求胜的可能性。本着这一认知，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重新探讨当时的政治生态，

① 参见拙文《“内轻外重”抑或“内外皆轻”？——评李细珠〈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兼论晚清政治史研究》，载于《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2期。

② 胡思敬：《军机不胜撰拟之任》，《国闻备乘》，卷四，上海书店1997年版，第94页。

分析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在塑造政治生态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围绕满蒙权贵着手展开 20 世纪初十年的政治生态研究，策划了“满蒙权贵与 20 世纪初的政治生态研究”这一书系。从选题火花到逐渐清晰再到杀青历时十余年（每一种著作出版时间各不相同）。作为书系的主编，我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就特别关注晚清政治史及权贵群体。<sup>①</sup>其后，有感于晚清政治史研究远没有穷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甚至还需要“创榛辟莽、前驱先路”。心怀这个梦想，我在指导硕博学位论文时，开启了“十年大计”。我们打算从史实出发，力图还原历史的本真面貌，研究当时的权贵集团与政治生态。我们所说的“权贵”，是指统治集团中位高权重、地位显赫的群体；而满蒙权贵则专指清朝统治阶层位于权力核心的满蒙王公贵族、旗籍高官及封疆大吏；有时候范围更小一些，指的是皇族近亲，大凡取这个意思时就称之为“亲贵”。清末，由于政治权力构成的复杂性，权贵群体很难完全排除统治阶级中的汉族高官，故兼及之。研究的重点是清末政治生态的样态、成因、流变；执政的满蒙权贵的政治认同及其变化；对改革的认知、决策、争论以及政改取向；满蒙权贵对宪政理解；改革实施等关键环节，阐发体制内改革的因应及成败得失。

那么，什么样的生态造就了清末的制度变革、人物遭际以及房倒屋塌呢？

## 书系的构成

我们试图在全球观照下，讨论清王朝最后十年的外部逼迫与内部矛盾、政策调整、改革举措，特别是聚焦于满蒙权贵的际遇、因应、行事风格、所思所想。试图推演清末政治生态以及“危机”对改革成败的影响。

书系包括九种专著，分别是：

<sup>①</sup> 我的硕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地方督抚与晚清政局》，于 1984 年完成答辩，此后心猿意马，直到三十年后才再次回到这一领域，真应了那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老话。

朱文哲:《王朝与国家:清末满洲贵族的政治认同》

周增光:《宗室王公与清末新政》

杨猛:《最后的家天下:少壮亲贵与宣统政局》

梁山:《清末政治与中日关系》

周福振、庞博:《“铁帽子王”善耆与时代变局》

闫长丽:《新旧之间:端方与清末变局》

连振斌:《重整河山:锡良与清末行政改革》

朱淑君:《赵尔巽与清末制度变革》

何思源、程学峰:《新政、新制、新文化:编订名词馆与贵胄学堂》

这些研究包含以满蒙权贵集团各个群体为视角的综合考察,以执掌中央职能部门的显赫亲王以及执政一方的满蒙督抚为中心的个案研究,还包括清末若干新设机构的个案研究。

在我们看来,清末新政乃至预备立宪既是形势所迫,也是自主选择。满蒙权贵先是颛预不足道,后是走向世界并认识了权力的变通方式(用立宪代替专制)。尽管他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处心积虑地维护着皇权,但毕竟不知不觉地拥抱了现代制度文明。就像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揭示的大革命萌生于旧制度所说的那样。即使王朝覆灭以后,清末新政以及立宪的一些措施依旧延续下来,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环或者一项制度性奠基。大如现代政治的形成、政治结构日趋专门化、政治职能的扩大和完善、政治组织趋于制度化、国家治理的法制化走向、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赋予、人民权利的宪法表达、现代生活观念的生成等,小如街道门牌的编制、衣食住行的变化,追根溯源,无不聚焦在那个时代。因之,考察它的过程、分析它的利弊得失、总结它的经验教训就具有了鉴往知来的意义。

我老是耽误自己。其实早些动手可以更从容地思考。但终日奔竞于日常琐事,每一次都是到交稿“大限”所剩无几才仓皇上阵,于是曾经的思考化为“大脑空白”,只好临时起意,匆匆了事。谨以为序。

孙燕京于朝阳袖手斋

丁酉腊月

# 目 录

- 1 绪论
- 14 第一章 宗室王公从政与清末政治生态失衡
  - 15 第一节 清末宗室王公的爵位与任官
  - 20 第二节 清末王公从政与中央政治生态
  - 26 小 结
- 28 第二章 清末宗室王公的政治心态
  - 28 第一节 趋公惟谨、明哲保身
  - 32 第二节 颀预揽权、固执己见
  - 37 第三节 从消极处世到积极参政
  - 51 小 结
- 53 第三章 宗室王公与军政变革
  - 54 第一节 整军经武之举措
  - 80 第二节 集权·西化·尚武
  - 91 第三节 变革军政之局限
  - 101 小 结
- 103 第四章 宗室王公与预备立宪
  - 104 第一节 缓与速的拿捏
  - 114 第二节 对于丙午官制变革的建言

124	第三节	缓乎？速乎？宗室王公关于国会召开缓急之论争
143	第四节	围绕“皇族内阁”的纷争与筹划
155	小 结	
157	第五章	宗室王公与满汉权力格局变迁
158	第一节	平畛域试撼旧格局
175	第二节	王公集权与中央集权：满汉权力新格局的形成
190	第三节	满汉权力新格局的影响
194	小 结	
196	第六章	武昌起义爆发后宗室王公的抉择
197	第一节	宗室王公与清帝退位
207	第二节	多数顺应共和
221	第三节	个别筹谋复辟
232	小 结	
234	结论	国之栋梁与腐朽的支柱
239	后记	
242	参考文献	
262	附表	

## 绪论

1912年2月12日，是清政府颁布退位诏书，为中国最后一个专制王朝画下句号的日子。那天的北京，虽然有人在日记中认为“天耶人耶，真勘痛哭”<sup>①</sup>，但实际上老天并未“痛哭”，反而天气晴朗，正如诗句“人和风日煦”<sup>②</sup>所描述。风和日丽并不代表人心平静，各类关于清王朝覆亡的思考既见诸公领域记载的报章报道，也见于私领域记载中的日记书信。在时人日记中已有人指出“其实乱亡之祸，早伏于十年之前”<sup>③</sup>。面临庚子后更深重的统治危机，清政府于1901年已下令实施新政，令群臣对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等方面的变革，各举所知，各抒己见，奏报朝廷以供参考。1906年，清政府又下令预备立宪，并在1908年公布《宪法大纲》，定下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所需变革诸事清单。然而，即便如此，清政府却依然走向了覆亡。为何清政府的政治改革阻止不了王朝的灭亡？时人尤其是民国时期仍以清遗民自任者，在归纳亡国之因时，无不把矛头指向宗室王公。林纾在与友人通信中讨论清亡之因称：“废经故足亡清，病在执政之亲贵。”<sup>④</sup>恽毓鼎在其日记中则详细罗列了执政之亲贵的种种劣行：“醇王承述父志，排斥汉人（重满轻汉，始于高宗，老醇王猜忌汉人尤甚）。助毫而贪，泽愚而悞，洵、涛童骏喜事，伦、朗庸鄙无能，载搏乳臭小儿，不足齿数。广张羽翼，遍列要津，借中央集权之名，为

---

① 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76页。如无特殊说明，本书所引相同书目均为首次注释所用版本，此后仅简注书名、卷册、页码。

② 荣庆著，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荣庆日记：一个晚清重臣的生活实录》（此后简称《荣庆日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

③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第576页。

④ 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网利营私之计，纪纲昏浊，贿赂公行。”<sup>①</sup>与清遗民归因不同，学术界已有研究主要是从革命党人的斗争、立宪派人士的策应以及地方督抚的助推等角度去尝试解答这个问题。事实上，探讨宗室王公群体在清末政治变革中的作为和作用，亦是一个值得考察的角度。

宗室王公群体是清朝满汉联合政权的核⼼，故而通史性著作在对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宣统政局、清帝退位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叙事中，不可避免地提及他们。<sup>②</sup>不过，不同时期，学界的关注点有所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学界对清末民初这段历史的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几乎始终将关注点放在“革命派”上。这一时期的王公贵族长期被视为革命的反面，以“反动人物”“失败阶级”的身份作为革命派研究的陪衬。但正如法国学者考茨基告诫人们的那样，“每当人们把历史变化引向阶级斗争时，往往过多地只看到社会有两个事业、两个相互斗争的阶级、两个稠密而一致的人群：革命的人群和反动的人群，一个在底层，一个在上层。照此看法，没有什么差事比写历史更容易的了。然而，社会关系并没有这么简单”<sup>③</sup>。所以，这一时期旁及王公贵族的研究难免带有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不过，简单化的研究并未持续太久。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的研究不断向广、深开拓，研究对象亦从支持革命或推动革命的一方，扩至立宪派，再至地方督抚等等。关于清朝统治集团的研究也逐渐兴起，但仍少有论著专门论述宗室王公群体。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与清末宗室王公群体研究相关的论著，较多是清代皇族研究所旁及的。如杨学琛、周远廉的《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sup>④</sup>，全书共分三编，前两编论述清代前期的八旗王公贵族，第三编论述清末至清亡

① 《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第576—577页。

② 如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虽然该书的历史脉络是以革命史为纲，但是在慈禧太后的“变法”、清朝的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立宪派等论题中，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宗室王公贵族。徐彻、董守义主编：《清代全史》，第九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对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官制改革、丁未政潮、宣统政局、皇族内阁、南北议和及清帝退位等重要历史事件的描述中，提到宗室王公如载泽、奕劻、载洋、载洵等。

③ 1889年法国学者考茨基在纪念法国大革命爆发一百周年时，写的《1789年的法兰西阶级革命》，[法]弗朗索瓦·傅勒著，孟明译：《思考法国大革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153页。

④ 杨学琛、周远廉：《清代八旗王公贵族兴衰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



后的宗室王公<sup>①</sup>；又如杜家骥的《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sup>②</sup>，考察了清代宗室王公身份的特殊性、皇族教育、宗室参政、皇家与边疆民族的联姻、宗室俸禄、庄田的拨发等，为进一步研究清末宗室王公奠定了基础。总体而言，清代皇族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包括皇族的人口<sup>③</sup>、教育<sup>④</sup>、经济<sup>⑤</sup>、封爵制度<sup>⑥</sup>等等，侧重清代前半段时期，属于古代史研究范畴。此类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者进一步研究清末诸王公提供了诸多便利。如吴玉清、吴永兴编著的《清朝八大亲王》<sup>⑦</sup>，该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记述了清代获“世袭罔替”特封的亲、郡王的

- 
- ① 第三编“从衰落到新生”，共分两章，第一章叙述民国时期清朝王公贵族的衰落——王公权势的丧失和王公庄园的丈放，第二章讲述新中国时期旧王公贵族及其后裔的新面貌。
- ② 杜家骥：《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8年。
- ③ 清代皇族人口研究是伴随着清皇族宗谱玉牒的整理与运用开始的。80年代中后期，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鞠德源即著有《清朝皇族宗谱与皇族人口初探》，载于《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呈报制度》，《历史档案》，1988年第2期。接着，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人文社会科学部的李中清也着手对清玉牒进行研究。李中清还约集国内学者如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鞠德源、胡启松，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郭松义，南开大学的杜家骥等人参与关于清代皇族人口册籍、清宗室等级结构及经济生活地位，以及与皇族人口研究相关的社会环境等题目的研究。1993年，李中清等诸位学者在北京召开“清代皇族人口及其环境——人口与社会历史（1600—1920）”学术研讨会。会后将其中部分论文修改结集出版为《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内收十三篇文章，大部分关于清皇族人口问题，如李中清：《中国历史人口制度：清代人口及其意义》；王丰、李中清：《两种不同的节制性限制机制：皇族人口对婚内生育率的控制》；李中清、王丰、康文林：《两种不同的死亡限制机制：皇族人口中的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杜家骥：《清代天花病之流传、防治及其对皇族人口的影响初探》；鞠德源：《清代皇族人口册籍》；蔡淑美、李中清、康文林、马文清：《“宗人府档案”电脑库的建立、分析利用及其困难》；赖忠文：《1840年后清宗室死亡率下降之真伪》；胡启松：《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宗室人口史料概述》；定宜庄：《清代皇族人口研究的重要成果——本书内容概述》。以上诸文俱载于《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 ④ 相关论著有：杜家骥：《清代的皇族教育》，《故宫博物院院刊》，1990年第2期。常晓辉：《清初的皇族教育》，《满族研究》，1999年第2期。冯月然：《陆军贵胄学堂研究》，中央民族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论文。
- ⑤ 相关论著有：李燕光、李林：《清代的王庄》，《满族研究》，1988年第1期。赖惠敏：《天潢贵胄：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
- ⑥ 对清皇族的承袭、封爵制度研究起步很早，相关论著有：[日]内藤虎次郎著，谢国桢译：《清朝初期的继嗣问题（一、二、三）》，《国学丛编》，1931年5月、1932年5月、1932年10月。陈捷先：《清初继嗣问题研究》，（台湾）《中央日报》，1960年5月31日。晏子有：《清朝宗室封爵制度初探》，《河北学刊》，1990年第5期。赖惠敏：《清代皇族的封爵与任官研究》，[美]李中清、郭松义主编：《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第134—153页。杜家骥：《清代的宗室封爵及其等级差别的特殊性》，《满族研究》，1997年第1期。
- ⑦ 吴玉清、吴永兴：《清朝八大亲王》，北京：学苑出版社，1993年。